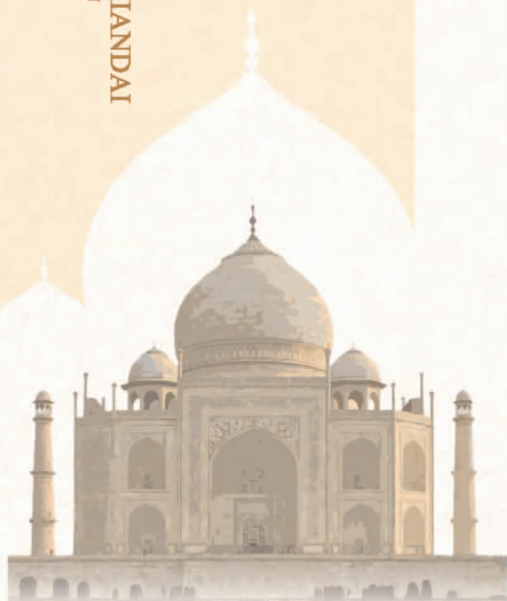


中印早期现代 转型比较研究

(1500-1800)

ZHONG YIN ZAOQI XIANDAI
ZHUANXING BILIAO YANJIU

王孟懿 著





作者简介

王孟懿 汉族，1979年10月生，贵州绥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讲师。2005年毕业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同年考取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湛焕义教授，学习和研究印度宗教族群及其文化转型，2008年毕业。现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历史系教师，讲授“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东西方文化比较”“明清史专题”“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主要研究现代早期中印转型问题，2013年主持完成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比较史学视角下的中印封建民族国家转型研究》，发表学术论文《锡克族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论锡克教民族主义及其角色》《论印度的苦感文化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等。

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中印早期现代 转型比较研究

(1500-1800)

ZHONG YIN ZAOQI XIANDAI
ZHUANXING BIJIAO YANJIU

王孟懿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THE ECONOMIC DAILY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印早期现代转型比较研究 : 1500-1800 / 王孟懿
著. --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22. 8
ISBN 978-7-5196-1176-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②莫卧儿帝国 (1526-1857)—历史—研究 IV.
①K249.07 ②K35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54679 号

中印早期现代转型比较研究 (1500-1800)

作 者	王孟懿
责任编辑	宋潇昶
助理编辑	杨保华
责任校对	李艳春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A 座综合楼 710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4 (总编室) 010-63584556 (财经编辑部) 010-63567687 (企业与企业家史编辑部) 010-63567683 (经济与管理学术编辑部) 010-63538621 63567692(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6-1176-7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王孟懿同志的《中印早期现代转型比较研究（1500—1800）》一书即将出版，是他主持的一项省部级课题结项成果的升华。他邀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著作写一篇序言，我欣然接受。回顾与作者王君的认识过往，概于2015年课题在研期间的省社科科研同仁群，实际晤面则是在2018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的“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周”学术研讨会期间。近四年以来，王君经常邀我研讨中印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方面的课题，令我获益匪浅。

孟懿君在学术思海的航行上一直比较勤奋努力，且不求多产。自2005年去广西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以来，他一直很喜欢关注和探讨印度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毕业后，又由于所在学校需要，他继续从事与世界史相关联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教学研究，并在东西方文明比较的学术思维历练上取得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成绩。其主持的课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早期全球化下中印两国现代性因素萌芽、增长和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等进行深入探究，助力提升1500—1800年期间“中国—南亚”文明交流互鉴史的研究水平。

现在，这项成果终于期以出版了，先在此祝贺他！

南亚次大陆在英国资本主义向全球南方扩张过程中起着殖民前哨作用。随着殖民者以印度作为前进基地向孟加拉湾、红海、中南半岛等周边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印度洋地区逐渐成为英国“内湖”，英属印度成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冲击了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体系。随着印巴分治，缅甸独立，麦克米伦政府在非洲、中东和远东地区的“战略撤退”，英国在印度洋地区构筑的殖民统治秩序土崩瓦解。“中印早期现代化”实质是东方社会形态下的一种资本主义萌芽，是处于早期殖民—资本控制下，被迫卷入世界全球化的单一“经济社会进化”的

模式，但中印两国人民在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下获益甚少，所得利润大部分落入国内投资者和地主的腰包中，且并未使其资本积累转向生产进步的投资上。两国早期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相同步，在近 300 年的时间，其市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对两国社会阶层分化、土地制度的变迁和社会进程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产生、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是两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缩影”，甚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大传统社会及其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艰难历程。

因此，“中印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之日起，不但为其国内统治阶级所重视又敌视，而且受到国际资本和机构的青睐。早在 16—17 世纪之际，中印两国的手工业品贸易商就向南海、孟加拉湾、斯瓦希里海岸等地出口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制品。而到 19 世纪初，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主导权逐渐落入欧美资本家手中，中印早期现代化自主发展的进程被迫中断。这一历史剧变不仅导致两国传统社会发生变化，而且对两国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这些特殊的社会历史土壤是否造成中印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和发展的不同？其与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否有着不同于欧美西方国家的特点？中印两国早期国家现代化转型又有哪些异同？带着这些问题，作者采用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相结合的宏大叙事理论方法，对中印两国早期现代化在区域社会变动中的真实样态与历史图景进行剖析。例如，作者对比分析了中印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战略定位，以及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国家现代化参与主体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关系的不同面相，认为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是中印两国现代化转型的内部动因，也是课题研究重点。这些论述和观点立足于系统丰富的史料，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于中印早期现代化发展和影响等问题，国内外学者虽然有一些研究，但只是从某一个维度或国别史比较研究视角，对西方新航路开辟至西方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期间的中国、印度现代化进程进行探究，还缺乏比较系统的梳理，特别是缺乏对两国早期现代化转型的比较研究。随着早期现代化、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中印早期现代化比较研

究的内容和主题也不断向纵深拓展。研究时段亦相继延长，资本主义式手工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活动尤其受到重视，地域突破更加显著。几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资本主义式手工业均有涉及。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印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中一个新兴的学术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两大文明关系史与互动史研究等领域的进展，甚至体现了印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但是，中国南亚史的进一步研究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其中，如何结合当前日益兴盛的区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探寻中印早期现代化转型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去认识历史与理解历史，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关注某个地方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地方现代化模式的相同之处，这其实是国家视角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投射或聚焦；同时注重某个地方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地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同之处，亦即加强分析现代化理论的区域性特征。

王孟懿同志的这本书综合国内外前人的研究，爬梳史料，系统论述中印王朝国家的兴衰型变有三层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用武力征伐建国统一走向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沉淀及“梯度封建化”，形成了军功贵族暂时把持与幼主继位的“武备文治”二世王朝。第二阶段是从中央集权的制度承新和改革走向皇权专制制度化，建成封建军事官僚制完善的四世帝国，依赖其理性皇权专制励精图治，实现经济和人口增长，出现新因素和契机。第三阶段是完备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六世王朝，中印全盛期尚有封建丛林扬鞭挥斥的空间和力欲，有行知自信；依靠朝贡宗藩体制与征服王朝的余烈“治国平天下”，有制度自信；封建经济的东方优势还有余力，封建国家主体还有体用自信。

总之，作者认为，两个大陆王朝国家统治者各自有理论理性、制度理性及其实践理性，但对现代性因素发展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没有发展起来。作者在该书中还对中印王朝国家转型存在时序反差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即长时段归因于封建国家明清在宗藩封贡一元单极东亚体系下闭关锁国形成的非耗散结构，与印度一直有入侵者、长期被征服造成的耗散结

构的千年殊异；中时段归因于16世纪起的300年，面对西方殖民VS资本势力形成的耗散结构，致使封建制度“内卷化”和排斥吸收西方新因素“负熵”；短时段归因于主流价值导向性缺失与主体实践导向性缺失，丧失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体用相克，行知失灵”。最终发现，两王朝转型的具体意义是制度内型变升级，而非现代性质变。其结构功能“内卷化”和排斥吸收西方新因素“负熵”，使封建帝国内生萌芽绝育，内缘型现代化走向“绝缘化”，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理性断裂，“转型主体”缺失。民族国家转型生成失败。

当然，我并不认为书中的所有论述和观点均已成熟且无差池。若是作者能进一步突破事件、制度与结构的框架，加强对国家现代化参与主体——农民、手工业者和贸易商活动轨迹的关注和分析，而不仅仅将他们作为“类”（群体或组织）的存在或附属物般的非主体视之，则可弥补中印早期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的不足，推动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由宏观向社会内部的微观层面扫描、审视和拓展。或许，这是因囿于其特定的学术理路与研究材料的客观状况，比如研究农民群众起义的史料要多于其在早期现代的经济状况描写和记述史料等。

中印两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演进、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差异最显著的无疑是边疆地区。两国同时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更是民族种类多、人文地理环境较为独特的地理单元，因此也是区域史研究最佳的举证对象。“转型比较研究”不仅是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过程，还有其一定的咨政启示与社会价值意义。该成果的完成有助于为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外交政策提供原创性、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支撑。同时，对中印两国现代化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考察，分析他国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抉择，促进文明互鉴及其体用之道的增智博识。

俞家海

2022年7月8日于广州华园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相关理论与概念的界定	(7)
第一章 文明梯度力作用下的全球背景	(11)
第一节 欧亚封建大陆国家兴衰及其海陆变局	(12)
第二节 欧洲民族国家主体叙事下的大变局	(16)
第二章 中印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兴衰型变	(22)
第一节 从武力统一到制度承淀经济恢复	(23)
第二节 在时地优势与增长中建成多民族统一帝国	(36)
第三节 “征服者世界与天朝上国”的契机及自信	(55)
第三章 中印帝国转型主体缺失的衰变四重奏	(71)
第一节 莫卧儿朝与清朝中央威权的衰落	(72)
第二节 主体衰败和社会断裂导致内外边缘化	(76)
第三节 封建内卷化的报应——各族大众起义	(79)
第四节 莫卧儿帝国分裂的锡克教视角	(85)
第五节 锡克民族与莫卧儿王朝的决裂	(97)
第六节 主流价值断裂导致萌芽绝缘与主体缺失	(121)

第四章 中印封建国家转型主体缺失的困境评述	(126)
第一节 千年殊途：文明的梯度力致使中印转型失灵	(126)
第二节 百年同归：全球化梯度力下中印转型失机	(142)
第三节 昙花若现：体克用失与弃行无知致使转型缺失	(165)
剑磨十年必发亮	
——为《中印早期现代转型比较研究（1500—1800）》题跋	(191)
后 记.....	(194)
参考文献	(196)

导 论

《中印早期现代转型比较研究（1500—1800）》是笔者在由本人主持的2013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比较史学视角下的中印封建国家转型研究》^①基础上完善的。本书主要聚焦1500—1800年中国与印度的王朝帝国，即清与莫卧儿帝国及其向现代性转向的问题，试图从转型动力、模式及遇到的全球性挑战的角度，去平视中印两个王朝国家具有的现代性因素，最终发现发展转型存在的文明梯度效应及梯度力作用的影响与客观动因，评析中印两个国家的转型失败及其“体行知用”的得失。

17世纪以来，当清王朝与莫卧儿王朝仍缓慢独步在其个别历史时间叙事的“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格局中时，西方世界已在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性条件中崛起。而到18世纪下半叶，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80多年后，清朝也在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中惨败，难逃半殖民地命运。为什么中印两个封建国家从异质文明殊途同归于被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列强侵略、被殖民地化而又有不同的遭遇和结局？作为国家主体的封建王朝及其制度本体，在中印的早期现代性因素萌芽、增长和自身转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基于以上问题，深入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国家主体（国家/皇帝/精英）的创制构建及其客体认知和价值（经济社会主流价值观、陆海防战略导向、疆域外制度与文化）践行，探讨、比较王朝世代的“兴衰型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笔者的选题缘起。

实际上，16、17世纪以来的东方处于“早期现代性”萌发未然之际，同期西方社会则正在有条不紊地酝酿着“早期现代性”，从局部的“现代性的‘属性表征’”逐渐转化成“现代性的‘主、客体世界实体化’潮

^①在本书中，“中印封建国家转型”的研究对象是“1500—1800年的清蒙从封建帝制国家向现代‘多民族共和国’转型的趋向因素”，而非“民族自决分立”。强调“现代性”是特征因素，“现代化”是内涵与整体潮流。

流”——现代化(modernization)大转型于是生发开来。从主体战略机遇把握、自然时间尺度和客体机缘上来说,中印王朝国家即将迈入近现代的门槛,有转型的契机。两国是置身东亚、南亚并起着经济和文化轴心作用的封建大陆王朝国家,其主、客体因素在封建化“型变”和现代化转型的轨迹上仍有基因残片可考。而且,这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倾力的重要传统。“正像印度历史学家正在调查莫卧儿王朝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一样,中国历史学家从1949年以后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索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①而且,我们知道:“一旦历史上有了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入近代社会的先例,这一由传统走入近代化的历程就不可逆转地、而又无可逃避地成为世界上一切民族的通例……近代化就非但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也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唯一无二的大事。”^②于是,在(近)现代化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二维理论的纵横交织下,我们要用好比较史学的视角,研究亚洲这两个封建国家到底是如何实现封建体制本身的型变升级和兴极而衰的,进一步比较两者内生早期现代性因素夭折和现代化转型的失败史事,为后进现代民族国家及社会转型提供某种历史启示。

本书第一章交代了全球格局背景及其生变土壤。中印比较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与背景需要厘清,即同期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生成是完全不同的,但都有作为现代化主体担当的重大意义。首先,西方500余年重大历史事件不是单一零碎事件,反而有内在因果联系的结构体系。从逻辑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崛起是从经济萌芽到思想解放,再到政治斗争实践的产物,是“雇佣关系工具理性化及其劳动异化”“社会生产经验的科学技术理性化”与“商业资本转型为产业资本”三对制动力要素增长与质变的结果。“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及其劳资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定型,并

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6.

②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J].学术月刊,1999(1):35.

实现“经济发展及其资本的实践理性化”^①“重商主义及供需方式的市场导向化”与“经济网络的开放性与全球化”，然后才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西式“制度理性化”。这才是西方社会结构经天纬地的系统性内生的转型逻辑。事实上也是这样：14、15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逐渐规模化发展，培育出了工场手工业、商业新业态及其阶级主体。1453年，两大事件，即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打出了英法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及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所灭，分别宣告英法“中世纪封建关系的结束和民族国家的自立”，“基督教圣城陷落，东部屏障和窗口消失”。作为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失去了到东部发财谋利的机会和陆路去往东方的交通。

西方为发财兴业而寻求新通道，推动了大航海（15—17世纪），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2—1502），为殖民者海外冒险发财与商业资本积累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外部条件。为适应主体内驱需要与客体条件改善，14—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殖民扩张、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反对宗教愚昧，宣扬人文主义，崇尚科学理性，批判君主专制，主张用工商业来夯实世俗生活，树立了“人文主义及其新教伦理”、科学实验与社科学术研究、“资本主义”的实践理性，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资产阶级梦寐以求当家作主的理想与实践，掀起了根本不同的两场革命：尼德兰革命（1566—1609）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对其领属并进行殖民地化的梦魇，通过民族自决和解放战争，建立了共和国。英国则通过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8），在不列颠王国原基上消灭了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进一步转型为新型民族王国。随着政治环境改善与生产发展推动，商业资本渗透和投资到生产技术领域，最终促成18世纪中晚期的工业革命。产业资本得势成流的工业化催生了欧美工商业态及其主体的民主、民族意识，促成了法国大革

^①在本书中，“实践理性”不是康德原创意义上伦理学的“道德意志”，而是指“可以实践的理性和理性规划了的实践”，是与人类的实践和选择有关的知情意，即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能动性。

命（1789—1794）与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等，由此启动了西方的全面现代化，形成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其次，深入民族国家转型的逻辑理性，来看转型主体的担当和核心动力作用：西方封建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是其资产阶级主体血与火的勇敢担当和历史胜利的体现。但是，在唯物历史观视阈下，主体政治以及整体现代化的造就和胜利，实质上是其特定客观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势造化、本体力量（人和）的具备促成、客体（认知水平与实践经验、生产力水平与思想觉悟等）条件的推动催生的。核心动力是主体（劳资）关系从封建依附向自由与雇佣关系转型，客体（生产力）从“农民或作坊工匠的经验手工半机械力”向“专业技术工业力”转型。这始终是资产阶级及其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推动获得的^①，是在全球性环境与世界市场的分工发育推动中获得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积极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世界历史的论说成果来看^②，15—18世纪以来，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纵向、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横向的发展方向的相互交织^③，最终使人类区域历史形成全球化的世界历史^④。在这种千年变局中，东西方生产方式、供需方式、价值诉求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化，国家的疆防战略重心开始从陆防转向陆海防并重，领海主权的重要性在增长。

第二章探讨了三个阶段性的主体构建及其契机、危机。与之相对照，回到中印封建国家主体视角，从全球化与现代化转型的二维大视野上来看，对两个封建大陆国家转型的基因残片进行解读，提出：历史社会学的“体行知用”就是“封建国家主体及其执行战略导向（政治社会转型和定型）”的钥匙。环视17世纪以来的亚洲与世界之格局，我们看到：从缔造

^①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意义”，已为历史学者所公认，民族国家是主体。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8—32.

^③杨和平. 现代化、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纵横发展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49. 无论是就“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内涵，还是就“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言，尽管它们有着自身明显的独特性，但从实质上讲，它们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

^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到转型，两个王朝先后走向强大。二者在统一初期屡有暴政，康雍乾、阿克巴到沙贾汉盛世时繁荣安定，再到乾隆帝与奥朗则布前期，为东亚和南亚的带来了繁荣和辉煌。但达到鼎盛后，它们却再难进一步发展。其主体的实践和认知仍然处于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控制过密化的扩张中，徘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制度创新缓慢而结构功能日益内卷化，主流价值导向挫失于没有“开海兴商”或“限洋自强”，致使以工商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主体缺失。

同时，用客体视角来观察和检视中印封建国家“型变三步转”的危机。对清与莫卧儿两个大陆王朝国家开展比较，从唐德刚先生“历史三峡”的转型论启示出发^①，把王朝国家转型成败分成三个层级或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用武力征伐建国统一走向（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承淀“梯度封建化”，形成军功贵族暂时把持与幼主继位的“武备文治”二世王朝。第二阶段是从（中央集权的）制度承新和改革走向（皇权专制）制度化，建成封建（军事官僚）制完善的四世帝国，依赖其理性（皇权专制）励精图治，实现经济和人口增长，出现新因素和契机。第三阶段是完备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六世帝国，结构功能“内卷化”^②和排斥吸收西方新因素负熵，使封建帝国内生萌芽绝育，内缘型现代化走向“绝缘化”，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理性断裂，“转型主体”缺失，民族国家转型生成失败。

第三章探讨了中印封建国家转型变局下的四重奏。中印封建国家的触角与实践始终未能跨出亚洲的封建大陆边界，仍然扮演着海内区域性力量的地域政治主角，仍然囿于传统文治武功引领田园牧歌的耕织社会模式，

^①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 [M]. 长沙: 岳麓书店出版社, 1999. 在1990年代成形“封建、帝制与民治的‘历史三峡’”论, 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 大概经过300年, 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造成“行同伦”的社会。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造成了行为不再同伦的多元化的社会。

^②“内卷化”(过密化, involution), 是指事物的功能、结构与活动方式重复而长久未发生质变或转型缓慢的规律。本书重点揭示封建国家在“体行知用”上的内卷化状况。

属于封建帝国的历史范畴。^① 同时迎来的则是中印两王朝不断整合国内的族群/地方分裂集团与宗教关系，日益内耗，任由社会内卷化固滞不前、绝育化老死无生、绝缘化失之交臂。转型演变为四重奏：帝国中央政府衰败，中印社会分别内部边缘化和对外被殖民地化，人民大众日益革命化，经济主流价值缺位并沦为全球的边缘区。在印度封建链条断裂的链式反应下，80余年后，中国在英帝国挑起的鸦片战争中成为半殖民地国家。

第四章对中印两国文明的转型困境异同进行了比较和评述。通过考察中印千年文明的深层动因，看到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形成的“梯度力”，造成中国“天下王土”与印度“率土裂疆”格局分殊；外来征服者与聚居宗族社会差异明显；多宗教种姓制与宗族宗法制的功能不同；征服王朝与宗藩封贡的体制殊异；古印度耗散结构与明清非耗散结构完全不同。16世纪起，两帝国已然面临前现代“封建化梯度力”与“全球化梯度力”的双重作用。但到鼎盛期，中印两国仍然戒惧主体民族的文化影响：乾隆厉行文化专制，乐于万邦来朝盛景；奥朗则布把异教徒踩在脚下。

究其根源和动因，不得不回到朝贡宗藩模式与征服王朝长时段的千年殊异以及封建化梯度力造成东方的百年同归的千年变局上来，看“体行知用”的主体得失，但都百年同归于一个非耗散结构的形成，主体“知行用”仅满足于“农体商用”“儒体西用”“穆体西用”及其“大陆征服”“夷夏大防观”的陆基征/防战略导向：一个向殖民者换钱筹饷用于征服功业，一个面对通商使团僵化到决意“闭目自听”。这表明封建制度与全球化和现代性相克，而君主“知行合于封建权欲驱使”，丧失卓越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体用受限于狭隘‘本末旧念’”，主体丧失更高追求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封建内卷化的宿命论的过客。

^①20世纪90年代全面兴起的美国“新清史”主张打破中国20世纪以来形成的“汉化论”的清史观。笔者则认为，无论是“汉化论”还是“内亚特性”，均不能否定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封建性”。

相关理论与概念的界定

一、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是一种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①，对两个或多个相似或相异的研究对象展开假说、验证和解释，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或共同性规律，提出和解答新问题的研究方法。就其维度来说，“比较史学”是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时间序列上前后阶段的纵向（垂直）比较，或者空间系列上同一阶段的横向（水平）比较，或者纵横维度上综合比较的一整套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比较史学”与“历史比较研究”，两者有着基于历史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区别。“历史比较研究”早在西方史学兴起和发展的希罗多德、塔西陀时代就有了运用与理论探索。但专注对历史本体或意识形态做“历史比较研究”，真正形成“比较史学”这门独立、系统的史学认知、学科体系及其流派，则是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

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于1928年发表《建立欧洲的比较史学》一文及其30年代末出版《封建社会》一书，被认为是西方比较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自1981年3月，周谷城先生在《光明日报》著文^②，号召开创中国比较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开展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来，在庞卓恒等史学界前辈及近年来的史学界专家和学人的努力下，已有不少学术成果发表，如范达人、易孟醇

^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 杨豫,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75—268.

^②熊家利. 中国比较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评范达人、易孟醇新著《比较史学》[J]. 求索, 1992 (4): 128.